

学术研究或学科建设是一个过程,从问题到问题,需要不同学人的共同努力,协同思考,相互辨析。孟华教授在国内率先译介比较文学形象学,2001年出版的《比较文学形象学》收录了欧陆比较文学学者的13篇形象学的研究论文。周宁教授集中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从2000年的《永远的乌托邦》开始,连续推出他关于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系列研究著作,2004年出版《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共八卷:《契丹传奇》、《大中华帝国》、《世纪中国潮》、《鸦片帝国》、《历史的沉船》、《孔教乌托邦》、《第二人类》、《龙的幻象》(学苑出版社)。乐黛云教授在第17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的发言“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中高度评价这套著作“为形象学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周宁历时十年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总结之作。但是,正如周宁教授所说,一部著作的完成,只是一个起点,一个开放向更多疑惑与思考的起点。《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这部著作就问题、研究的观念与方法而言,都是开放的,学界的反思与批判,将从此开始。本刊发表周宁教授、方维规教授、伍晓明教授、张西平教授、刘康教授、李勇教授的相关文章,以“天朝遥远”为话题,讨论形象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其中有对周宁教授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质疑与批判,也有推进、深入性的反思。我认为,这是我国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界学术上有分量的一次圆桌笔谈。

周宁教授的《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问题》明确将自己的研究定义为“跨文化形象学”,以理论自觉的态度反思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问题”,提出跨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在于从思想中拯救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主体。研究的立场与问题是不回避的,学术眼界本源于此。周宁教授希望进一步说明跨文学的中国形象研

究为什么研究、研究什么、如何研究、如何进一步研究。这篇文章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与反思自己已有的研究,试图对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作基本的界定,区分跨文化形象学与比较文学形象学、域外汉学研究的异同之处。第二部分提出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问题,进一步思考两组相关的课题:一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自我东方化”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的西方形象和“西方主义”的问题;二是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彼此东方化”的问题。周宁教授的文章明确有自我超越的意识。不论是他已作出的研究,还是预见的课题,都值得深入思考。

方维规教授的文章《形象、幻象、想象及其他》试图在研究本体意义上辨析形象学的基本概念,其中涉及比较文学学科意义上的“形象学”问题,也关乎历史文化层面上的“形象”问题。方维规教授认为,中国学界一般只关注“他者”或“异国”形象,几乎不见明确的有关“自我形象”的论述。而“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是形象学的两个相辅而行、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而“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在研究中是应该明确区分的。周宁教授的研究在这一点上语焉不详,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的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说的究竟是西方的“他者形象”还是“自我形象”?另外,形象学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也含混不清,“形象”、“幻象”、“想象”概念三个概念的使用,就需要仔细辨析。首先,在认同形象学研究不是辨别形象真伪的前提下,使用“幻象”明显不够妥当,而且,“想象”突出形象的“虚构性”,很可能彻底否定某些“形象”与客观存在的联系。

伍晓明教授从“理论的自觉”的高度质疑周宁形象学研究的基本概念。首先是关于“形象”本身的理论。伍晓明教授仔细辨析《天朝遥远》中关于形象的定义,发现其内在的矛盾:形象必然始终都是某种事物之形象,而西方的中国形象则当然只能是西方所见到的“中国”的“形象”,无法避开形象与其所“再现”或所“代表”或所“表述”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所谓“并不代表形象之外的任何东西”的纯形象是可疑的,或者质疑“形象”这一概念本身,或者放弃这一概念。由此深入,伍晓明教授指出,周宁假设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并没有解决基本概念中的矛盾,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以对于“客观的知识”或“真实”的某种所谓后现代式的否认来取消这一有关形象与实际、表现与被表现,或表述与被表述之间的复杂关系的问题,而是对于此种复杂关系进行真正的理论分析或哲学分析。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是嵌在中国的(某种)西方形象这一背景之上或植根于这一语境之中的。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时,是否也有必要首先

即对“中国的西方形象”进行质疑?如果以同样的定义界定中国的西方形象,“中国的西方形象”是中国“文化的表述,自身构成或创造着意义,无所谓客观的知识,也无所谓真实或虚构”,那么,一项由“中国”进行的对于“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客观研究又如何可能?理论是在批判意义上达到自觉的,伍晓明教授的批判,指向了形象学研究新的问题与方向。

本组文章主要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形象学研究的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基本概念与方法的问题,二是形象学研究的理论资源的问题。张西平教授的文章反思赛义德《东方学》对形象学与汉学的影响,具有宏观理论能力与敏锐的批判意识。张西平教授明确指出东方学所提供的方法是有一定的问题的,依靠这样的理论来展开西方中国形象的研究,必须慎重。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并不都是“集体想象”,西方汉学的科学性不容否定。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不能以偏概全,不能因西方东方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就完全否认它其中所包含的“客观性”,不仅研究的知识内容要和“意识形态”分开,赛义德所说的意识形态也要作具体的分析。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历史观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如果完全采用赛义德的理论,“社会科学理论几乎要遭到彻底的摒弃”。这已经不仅是汉学问题,而且是现代社会科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

刘康教授关注跨文化的中国形象传播的现实与策略问题。中国在西方眼中的形象始终受到中国人的特别关注,这是因为西方的强大,因为西方完成了的现代化是中国所追求的目标。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个理解“视阈剩余”(巴赫金)的问题。每个国家和地域(如我们这里泛指西方)也拥有类似的视阈剩余。巴赫金的理想是让拥有不同立场和视阈剩余的独立主体开展公平、自由、平等的主体间对话。但理想永远无法取代现实。认真梳理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史,这不仅是为了知己知彼,也是为了从历史的纵深来把握西方语境中的当代中国。刘康教授指出,“反写”或反思赛义德模式来思考西方的中国形象,一是须从现实回溯历史,最后回到现实,即当代主要由西方传媒来承载的中国形象塑造。再就是把中国作为(西方)现代性整体过程中的一个建构主体纳入视野,中国是如何塑造自己的世界(西方)形象的?

李勇教授提出形象学研究范式的文化转向问题,认为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角度研究作为表意实践的“西方的中国形象”,已超出了狭隘的学科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范围。在文化表意实践意义上分析中国形象,包含着两个层次:一是“中国形象”在其中产生文化意义的意义网络或话语系统,二是西方用中国形象所表达的愿望与欲求产生的现实基础。而在这里要讨论的不仅是东西方关

系对中国形象的文化意义产生的影响,而且要讨论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问题的价值立场,这个立场就是超越东方主义。确立起超越东方主义的价值立场,意味着实现三重超越,一是超越东方主义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采取历史化具体化思维,将中国形象描述为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二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视角,采取东西互动对话的全球视角;三是超越西方霸权的价值立场,采取全球普惠的价值立场,在跨文化对话中建立全球平等的话语秩序和价值理念。

周宁教授在《天朝遥远》的前言中说,《天朝遥远》希望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走向理论的自觉。同时,他也意识到,任何研究都是向问题开放的。本刊发表系列笔谈初衷不在书评,而在深入持续地讨论问题,促进该研究领域的成熟与自觉。感谢同仁们的智慧与努力!